

辦事處

澳門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9樓A座
電話：(853) 780 124 傳真：(853) 780 565
電子郵件：cpedm@macau.ctm.net

Office

Rua de Xangai Noº 175 Edf. ACM 19º A Macau
Tel : (853) 780 124 Fax : (853) 780 565
E-mail : cpedm@macau.ctm.net

發展策略

Development Strategy



編者語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至今的短短半年內，澳門市民發揮了“主人翁”的精神，對整個特區政府的行政運作以至各項社會事務，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問題的關心和參與程度都大大提高了，這是有目共睹的。在三月下旬澳門特區政府發表首份《施政報告》以後，振興經濟、提升本地工人就業率，更成為了社會上關注的熱點。而澳門特區政府對社會問題的回應亦明顯比以往積極。目前，政府和民間均以務實的態度，努力尋求解決澳門社會現存問題的方案。

作為一個立足澳門的民間學術研究機構，本中心對於澳門社會事務是同

樣關注的。近期，本中心舉辦了多個內部座談會，分別就本澳的政治、經濟以至社會問題等進行了探討，希望藉此能夠對相關問題提出具參考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出席這些座談會的人士除了有本中心的成員之外，還有部份社會上的專家和學者。透過這些座談會的舉行，除了可以深化我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之外，亦同時加強了本中心與澳門各界人士的互動交流，增強了彼此間的溝通和聯繫。

在今年四月上旬，為了加強與內地的學術交流，本中心還特別邀請了本中心的名譽學術顧問、國內經濟學權威厲以寧教授專程來澳訪問。厲教授

在澳期間，除了與本澳各界進行交流和考察外，還舉行了一場專題演講會，向澳門各界人士介紹了我國的經濟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路向，加深了本澳各界對國內經濟市場動向的認識。

今期的《發展策略》特選登了部份本中心在近期所舉辦的演講會和座談會內容的紀要，希望藉此與社會各界朋友分享與會者的心得和見解，以期達到拋磚引玉、啟發思考的目的。我們深切盼望各界朋友能夠對所刊出的內容以及本中心的各項工作提出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以期達到相互促進，共同進步的目的。

“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及未來路向”演講會紀要



為加深本澳各界人士對國內經濟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認識，本中心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周五)晚上八時

正，假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四樓“何賢先生紀念堂”舉行了主題為“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及未來路向”的演講會。演講會邀請了本中心名譽學術顧問、我國著名經濟學權威厲以寧教授發表專題演講。

厲教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曾經出版過不少探討中國經濟問

題的著作，提出了許多獨到的意見和建議，對國內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政策的制定都有較大的影響。厲教授是次演講內容精辟、獨到，使與會者對國內目前的經濟環境有了深刻的認識和了解。現將有關演講內容整理如下：

一. 加入WTO給中國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要研究中國今後的經濟取向，必須要一併考慮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加入WTO的問題。加入WTO對中國來講，肯定是一個機遇，從中長期來看，完全可以肯定利大於弊的，但是不能忽略的

是，在短期之內，加入WTO將會為中國帶來三個重要的、嚴峻的挑戰：

(一) 市場競爭的加劇

現在國有企業的效益並不理想，雖然去年的盈利達到90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但相對於幾萬億元的國有資產來說，這個盈利率仍是很低的。同時，現在市場仍面臨着銷售不旺的問題，在這情況下，外國的產品進入中國，外國的服務業進入中國，中國應怎樣應付？現有客戶仍能繼續保持嗎？假若現有市場被外國的產品和服務所佔領，中國將會如何？企業效益的下降將會造成財政的損失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是必須面對的，中國加入WTO，確實會加劇市場的競爭。

(二) 大才的流失

中國加入WTO以後，外資進入，外國的銀行業、保險業、大企業都將進入中國市場。根據跨國公司的戰略，它不可能派很多僱員來中國，只會派來幾個主要的高層管理者，然後採取僱員本地化。僱員本地化對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有以下幾個好處：

1. 成本較低。若從外國派僱員來中國，成本較高；若僱用本地人員，即使所給予的薪金較本地機構(包括研究機構、企業)為高，但仍比聘用外國人員為低，因此，薪金的成本比較低。

2. ~~本地~~僱員熟悉本地情況，可以即時到位，一些服務性行業更可以把舊有客戶帶到新公司去。

3. 根據跨國公司的戰略思想，競爭對手的力量被削弱，就是自身力量的加強。外國企業從本地企業中挖走一個骨幹，本地企業的力量就會被削弱，而外國企業的力量就會增強。

根據上述情況，將出現一個問題，跨國公司所給予的薪酬比內地企業為高，那麼，國內企業原有的骨幹(如博士生、碩士生、外國留學生等)仍會留在內地的企業內麼？他們會否都被聘用到跨國公司去呢？

(三) 就業問題將會加劇

目前，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很嚴重了，估計今年城鎮登記的失業率可能達到1,200萬人。在加入WTO以後，加劇的競爭可能會為勞動市場再帶來三部份的勞動力：1. 某些國有企業在競爭中失利，唯有減產、萎縮，分流出一部份勞動力；2. 在過去，許多鄉鎮企業是適應於短缺經濟條件下的，有部份現在已經感到困難了；在加入WTO以後，將會有一部份鄉鎮企業被衝跨，分流出一部份勞動力；3. 在加入WTO以後，外國的糧食、水果、奶製品等農產品將會進入中國市場，帶

因為只有加快開放，才能促進國內的改革，假定國有企業仍然處於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況下，把改革的步伐拖得很慢，是無法經得起加入WTO以後的衝擊的。《孫子兵法》提到：“置諸死地而後生”，中國的企業必須到面臨壓力的地步，才意識到非改不可，必須真改而不能假改。目前有些國有企業改革只是相互合併，簡單的改個名稱，並不是真改。現在不行了，必須真的改革。只有這樣，國有企業才能真的改革過來，取得新的競爭力，中國的經濟才能踏上一個新的台階。所以，加入WTO關係到中國的“背水一戰”問題，是必須加入的，並須趁此機會加快改革。



(二) 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如何面對加入WTO的問題呢？

必須加快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這是當前的首要任務。管理是重要的，但管理不能代替改革，管理是個永恆的任務，任何時候都要加強管理，但不改革管理的收效是不大的，在改革的基礎上，管理才出現效益。我們經過大量的企業調查，發現一個重要的論點，不改革國有企業，企業也能搞好，但只是烽烽火火的短短三年而矣。理由何在？經調查了解得出，有以下五種情況：

1. 在企業領導個人能力強、開拓精神強、社會責任強的情況下，企業搞好了，但在原來政企不分的體制下，在企業搞好並有成績以後，有關的領導人便被調派去當官了。組織部門的理由是，要挑選幹部當然要從良好的人員中去選。當原有領導人被選拔以後，新的領導人在能力、開拓精神、社會責任感等方面都不如他的話，一個良好的企業就會逐漸走下坡。

2. 企業搞好了，但是在政企不分的體制下，在投資主體不承擔風險的條件下，很容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由於企業有成績，就好大喜功，擴大建設規模、增設分廠、增設企業，並敢於向銀行借錢。由於投資主體不承擔

來的競爭很激烈。同時，在市場競爭的狀況下，農產品已經積壓著，中國的農產品價格要提高亦不可能了，因此，農民的收入就有可能進一步下降。若農民的收入真的進一步下調的話，就有可能加大農村人口的外流。目前，中國農村人口過盛，且在國內總人口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若果農村人口的外流真的加劇，就有可能加重了大城市的就業壓力。

中國人的頭腦必須非常清醒，加入WTO既能帶來好處、機遇，但這些機遇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經過努力爭取回來的。另一方面，加入WTO亦將帶來挑戰，上述三大壓力就很現實的擺在面前，只要一旦對外開放，壓力就會馬上出現，應如何面對？

(一) 首先一定要認識的是，即使有壓力，但中國必須加入WTO，為甚麼？

風險，只搞營業，而其營業狀況不錯，銀行也願意借錢予他。但這些可能是無效益的投資、盲目的建設，當宏觀形勢一改變，能形成生產能力的，所生產的產品賣不掉，積壓下來；未能形成生產能力的，在一段時間以後，銀行就不再給予貸款，企業就背上沉重的債務包袱。結果，只好把賺來的錢都用來還利息，到最後利息也無法償還了，一個好的企業從此便走下坡了。

3. 在政企不分的體制下，對於好的企業，地方行政主管部門、上級部門的主管部門就會給予其他的任務，如要求好的企業把經營不善的企業兼併過來，可無須支付成本。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零成本的兼併也並不一定是好事情，因為任何兼併都是成本效益的對比。企業雖然不用付出任何成本，但背上多了一個大包袱。但是上級的命令是必須服從的，企業唯有奉命兼併，到最後，這個好的企業就被兼併回來的大包袱所拖垮了。

4. 在政企不分的體制下，上級主管部門、地方行政當局會把有了成績的企業牢牢的控制着，當成是小金庫，要企業服從其命令，向企業要錢、要物，如果不服從，便給企業“穿小鞋”。如領導要出國考察、買車、宴客等，都須企業付款，這樣一來，企業的資金就往這個無底洞裡流，導致廣大職工的積極性也沒有了。此外，企業在財務方面的漏洞還有很多，都會把好的企業拖垮掉。

5. 中國有句老話，“共患難容易，共安樂難”。當企業處於困難時期，對於如何能讓企業擺脫困境，領導班子是很團結的，大家為了一個目標，共同把企業搞好。一旦企業有了成績，情況就會不一樣。在上級表揚時，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漸漸便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在下一階段的決策當中，就會出現各種分歧，裂痕不斷地增大。逐漸地，領導班子

分成了兩派，這一派向上級寫信投訴，另一派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對方便反駁說，存在問題的並不是自己。為了了解情況，上級唯有展開調查，調查工作一展開，一待就是半年。在此期間，人心煥散，生產沒人抓，投資機會喪失，雖然到最後調查結果是企業並不存在甚麼大問題，可是，這個企業已經被折騰得不行了。

以上的五種情況充分說明了，改革是必須的。管理是長期的任務、永恆的任務，改革之後再加強管理，我們這個企業才能搞好。光靠好的管理，



也可搞好企業，但不是持久的，上述的五種情況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在企業的改革中，可以有兩種導向，一種是“利益”導向，另一種是“危機”導向。所謂“利益”導向是指，企業在今天搞得很好，但是仍會向前看得更遠，在未來有很多盈利的機會存在，企業要求自新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把未來的潛在利益都拿到手，這是“利益”在推動企業改革。而所謂“危機”導向是指，企業在無法繼續生存、非改不可的情況下才去改革。國內的大多數企業、國有企業都是危機導向的。以首都鋼鐵公司為例，在80年代年是經營得非常好的，經營方式是承包制的，國內的各地都以其為學習榜樣。當時，首鋼就曾召開過一次會議，邀請經濟學者出席，本人也是被邀請的其中一位，並發表了講話，個人認為首鋼的承包制是不規範的，是

不值得推廣的，必須改為股份制經營，這將使企業的發展更好。但這意見完全不被接受。試想想，如果首鋼在80年代就改為股份制，今天的首鋼就遠不是現在這個模樣了，成績會多好。當時不改，到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並發表講話時，又是另一個時機了，仍然不改，繼續維持承包制。到了去年，首鋼出現了困局，才開始改革，雖然遲了總比不改好。但是，形勢已經不一樣了，企業在去年上市，如何能跟十多年前相比，這是白白錯過了大好的機會。這就說明，中國的企業存在着危機導向，為什麼會這樣？這並不是某一個領導有沒有眼光的問題，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企業領導人在改革中得與失的不對稱。假定企業經營得很好，但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決定改革。然而改革總是會有困難的，總會碰到各種各樣的磨擦和衝突，假如因此而造成改革不能順利進行的話，上級就會馬上來調查，他們會認為，企業原來是經營得很好的，還是要改革，改成這樣，令到企業經營有困難了。這就出問題了，所以，當企業處於經營良好的狀況下，便不想改革。又假定改革很順利，所得到的利益是整個國家的，企業可能也得到好處，但領導個人卻可能會有所損失，因為如果在改革過程中存在任何麻煩，領導都會受到損失。所以國有企業多會在處於危難時期，無法再經營下去時，才會進行改革。

然而，到了今天，在中國快將加入WTO的情況下，不管好企業還是壞企業，都必須進行改革，因為在中國加入WTO以後，形勢一改變，企業還能怎樣？所以，對於這個問題，必須認識清楚。

二. 國有企業在資產重組中，對市場的顧慮必須打破。

目前國內存在着一個很大的阻力，是意識形態的阻力。所謂意識形態的阻力大概包括以下的內容：

(一) 是百分之百的國家投資好呢，還是國家控股好呢？這個問題存在爭論。有人總認為，百分之百國家投資的企業是很好的，如果是控股企業，資產只有一半，或者只有三分之一，那有甚麼好，國有企業的經濟力量就會削弱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甚麼是有本事？有本事不是代表你擁有多少錢。例如，投資 100 億籌組一個企業，百分之百的國家投資，這說明國家投資 100 億，企業建成後能夠掌握的資產就僅僅是 100 億，由於是百分之百的國家投資，資金是國家的，並不是企業的本事。假如是百分之五十能控股，國家投資 100 億，資本是 200 億，因為其中 100 億是別人的資金，但由於是國家控股，所有資金歸企業運用，即是由國家運用；假如是百分之三十能控股，國家投資 100 億，企業的資本是 300 億，其中 200 億是別人的資金；這才算是有本事。而國有經濟並不因控股而削弱，反因控股而加強，因為能把更多的社會資金拿來歸企業所用，因此，這個概念一定要改變，只有這樣，國有企業才能進行資產重組。

(二) 過去，廣東人有句老話，“靚女不能先嫁”。目前，國內許多企業都存在類似的觀念，“靚女”(指經營良好的企業)都嫁掉了，剩下的“醜女”怎麼辦？這裡首先不評論這個觀點是否正確，先來探討“出嫁”是否好事，企業的改革、股份制的引入、資產重組的具體策略和措施，對企業的未來發展是否有好處。假如“出嫁”是件好事，有利於企業的未來發展和壯大，可以增加國家的稅收，增加社會的就業機會，那麼，無論是否好的企業，都應該“出嫁”。否則，就根本不需要考慮是否“靚女”的問題了。企業決定要“出嫁”後，是否成功，還須視乎市場上是否存在需求，以及需求的對象是誰。如果堅持“靚女”不先嫁的原則，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都不能比差的企業先“出嫁”，而“醜女”又不能隨心

所願的成功“嫁出”時，便會把好、差的企業都困在一起了。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市場經濟競爭激烈，加入 WTO 以後的挑戰更大，不及時進行改革、重組的話，良好的企業還能維持效益多久？“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無論效益好的、差的企業都要不失時機地進行改革，效益好的，要價可以高一些，差的企業給予的條件便優惠一些，以加快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的步伐。因此，“靚女不能先嫁”是另一個需要解除的思想顧慮。

(三) 目前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存在着一種不正確的做法，就是以拉郎配的方式進行假改革，在國有經濟的大框架內，隨便拉一個企業來合併，便算完成了改革，結果導致重新組成的企業仍然是無生命力的，經不起市場的衝擊，這可能是無效益的改革。因為凡事都必須採取適當的方法，厲教授以一個日本漁民以獨到的方法，把捕得的鰻魚養活從而賺取到比其他漁民為高的利潤的故事，說明了國有資產的重組，應該把門打開，讓社會上各種資金，包括國內外的資金都可以流入，使原有企業能夠改變成具有生命力的集團。

如上所述，讓社會上的各種資金流入國有企業體系內。當中，目前國有資產重組中的重要一條就是，要讓民間資本介入。因為現時中國的民間資本是不少的，據統計，銀行的儲蓄存款就有 6 萬億，其他手頭現金、股票、債券及其他可變現資產加起來就有幾萬億，這些資金都無法找到合理的投資渠道。企業就可以利用各種方法，把這些民間資金引入國有經濟體系內，鼓勵以個人投資、組成民間的有限責任公司或公共投資私營等方式，去吸引大量的投資。假如有五分之一的民間資金被吸引出來，就有 1 萬多億，加入到各個領域當中，情況就馬上發生變化了，資金到位了，機制的改革開始了，企業的體制便隨之發生改

變，經濟的多元投資主體的企業出現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對外開放先對內開放，給予外商待遇先給內商國民待遇，只有這樣，中國的企業才能形成有生命力的集團，才能抵禦到外商的進入。如果不採用此方法，國有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就不利了。

此外，目前國有企業中的中小企業的改革有多種形式的選擇，比較容易處理，但對於一些由國家控股的重要行業，或者資產上百億的大企業，應如何改革？如果全盤上市，市場無法容納，同時，在一個大企業之下，有很多的小廠，其利潤率各不相同，合成一個整體的話，平均收益率就下降了，缺乏投資的吸引力，所以大企業的改革是一個難點。經過幾年的改革經驗總結，得出了三句話：“挑選一個好兒子上市”、“弟弟兼併哥哥，把哥哥變成自己的兒子”、“通過配股，兒子逐漸消化老子”。

第一句話的意思是指，大企業全盤上市是不可行的，那就從眾多的屬下企業當中，挑選一個最好的，或者把二個最好的企業合併成一個企業上市，這樣，上市企業的資產規模不會太大，同時，經營利潤良好，具有吸引力。

第二句話的意思是指，屬於哥哥輩的大企業都是老廠，幾十年前建的，設備老化、人員臃腫、效率低，不能上市。而可以上市的弟弟多是新廠，在其上市後，籌集到一筆資金，除了自身機制的改革外，還可以幫助哥哥。但是弟弟現在是股份制企業，是須向股民負責的。因此，只能以兼併的形式來幫助哥哥，這樣就使哥哥在集團之內降級了，成為了弟弟的兒子。

第三句話的意思是指，一個股份公司如果有盈利的話，每年是可以擴股一次的，以配股的方式進行。在過去，私人企業、外商企業都進行配股了，但國有企業沒有進行配股，因為欠缺資金，這樣就會讓大好的機會溜走了。為了爭取這個機會，國有企業現在採取兩種方法：第 1，國有企業

同樣參加配股，但是把所配股份放到市場上出售；第2，國有企業同樣參加配股，並且雙方預先協議好，採取“以物易股”的方式，以配股企業所需要的廠房、設施等代替資金來換取配股。這樣，經過幾年的以物換股後，兒子就逐漸把老子(原來的大企業)消化掉了。

目前國內許多大企業都是以上述三種方式進行改革的。這樣，國有資產的重組便得以實現，企業的實力就得以加強。

三、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

要與國外的企業進行競爭的話，產業必須升級，架構必須調整，這個問題是值得研究的。結構調整提出已經這麼多年了，仍無法實現，是因為確實存在困難。這個問題可以用經濟學上的“木桶原理”去解釋。一個由長短不一的木板條組成的木桶，其載水量多少，不取決於最長的木板，又不取決於各木板的平均長度，而是取決於最短的木板的長度。這個“木桶原理”就是“短線決定原則”。如何解決？有兩個方法，1. 以長線補短線，或稱生產要素的替代；2. 資產重組。

但這兩個方法的運用在原有機制上都遇到了不同的困難，在採用第1種方法時，由於這些“長短不一的木板”是分屬於不同的部門、地區的，難以取長補短，它屬於生產要素的跨行業、跨地區流動，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採用第2種方法，則可能更為困難，因為在重組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現少了“一兩條木板”，這是在過去的日子中，國有資產的回收所造成的。

所以，必須在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中，把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結合在一起。光有制度創新而沒有技術創新是不行的，因為這只能把體制改善，而無法推出新的產品，佔領不了新的市場，企業仍然沒有前景。然而，光有技術創新，制度上不改革，則技術創新困難重重。所以，必須結合。可通

過產權轉讓的辦法，讓供、求雙方通過協議進行轉讓；又可通過上市收購、增發部份股票等來引導投資，以加快結構的調整，使產業升級。

在發展技術、產業升級時，對國內來講，以下幾個觀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1. 要發展高科技行業。國家對於某些高科技行業是有特定含義的，並不是每個地區都具備條件發展這些指定的行業的，那麼，這些不具備條件的地區，如何發展高科技行業？

其實，每個行業都可以有高科技，只要能夠利用科技研究、發明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新產品，就已是高科技行業了。以內蒙古為例，他們都希望發展高科技行業，對於特定內容的行業，現在是不具備條件的，因此，建議其利用現有資源——綿羊，研究生產類似澳洲的綿羊油產品，這些產品目前在國內是沒有的。這就是高科技了。經濟學上有句名言，“從來就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技術”。只要技術上去了，產業就可以得到發展。

2. 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現代企業管理都需要人才，上面提及過，加入WTO將使人才流失，那麼，要用甚麼條件來吸引、留住他們呢？

首先，國內的企業正在研究一個“公平和效率”的問題。甚麼是公平？“平均分配”是不是公平？在一般的情況下，是不公平的。幹多幹少一個樣，幹與不幹都得那麼多，如何公平？但在特定的條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的。例如，一個城市在三年大旱、食水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對居民進行食水的平均分配，不論官民、貧富，每人都分配一桶食水；又如在發生嚴重災難的地區，把收到的振災糧食按災民數量進行平均分配等，這些特定條件下的“平均分配”是公平的。其次，“機會的均等”是公平的。機會的均等是指大家都是在同一起步線上出發的，然而，每個人的社會背景、家庭環境、個人經歷等都不相同，是無

法在同一起步線上出發的。但是，我們仍然認為，機會的均等是公平的。此外，大家說，“收入的合理差距”是公平的。然而，多大的差距是合理的？

“公平”能否有新的理解，或者補充的理解？有，公平來自認同感。即是說，只要對所屬的群體，包括家庭、企業有認同感，公平的意識就會增強。生活在同一個家庭的三個孩子，由於經濟問題，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各不相同，最大的孩子對家庭的承擔最多，只能讀到中學；隨着時間的遷移，家庭狀況有所改善，第二個孩子可以讀大學，最小的孩子可以到外國留學了。此時，大孩子不會認為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為他對家庭、對父母的諒解和認同，所以沒有不公平的感受。企業也一樣，如果員工對企業有認同感，就會在其危難時共渡時艱。所以，要留住人才，就要營造公平的氣氛，爭取認同感。

甚麼是“效率”？效率有兩個基礎，一個是透過先進設備、熟練勞動力來產生效率，是效率的物質基礎；另一個是來自道德觀念的效率，是效率的道德基礎。以物質為基礎的效率，只能是常規的；而以道德為基礎的效率，是可能會產生超常規效率的。當一個民族處於自然災害、外來侵略或移民社會的環境下，就會產生很大的凝聚力、很大的戰鬥熱情，這就是以道德為基礎的效率。工作的積極性就是道德基礎在起作用。

既然公平來自認同感，效率又是道德在起作用，那麼，公平與效率就是相互促進的了。企業必須營造這種環境，才能把人才留住或者吸引過來。

其次，是激勵機制的改變。在未來，以獎金作為激勵手段所帶來的高成本，將會是企業無法承擔的。如上所述，外商已經進入中國市場，他們所支付的薪酬總會比國內的企業為高，這是國內企業所無法競爭的。因此，企業可以考慮以股權獎勵的辦法來作為激勵措施，對那些有貢獻的高

級管理人員、高級科技人員，送贈股權作為獎勵，這既可作為激勵的手段，又可以將企業的利益和這些高級職員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當中，重要的一條是，這些用作獎勵的股權在短期內是不能出售的，要等幾年才可以拿到市場去出售。幾年後，企業有了好的經營，再把這些股票在市場上出售，就可以為這些人才帶來收入，而這部份的成本，便不需要企業來承擔，而是由市場來承擔。這樣的話，在將來外資進入了中國市場後，國內的企業無法在高薪方面與之競爭，但可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股權獎勵制度來吸引人才。

四. 經濟持續增長的問題

當前，中國必須保持高的增長率。很多人會問，百分之四的經濟增長率已經是高的了，為什麼中國必須長期保持百分之七、八的增長？發展中求穩定是真正的穩定，運動中保持平衡是真正的平衡，目前國內的經濟問題必須要在增長中才能解決。如要解決就業問題，只有經濟增長了才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又如要解決財政收入的問題，中國是以間接稅為主要稅收來源的，所以只有經濟增長，才可以解決財政收入的問題。再者，中國要縮小與先進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必須抓住今天的機會，現在不追，到將來就更趕不上了。那麼，中國是否有可能保持著高的增長率？

首先，從經濟增長的結構分析方面來看。經濟可分成三大產業，而經濟的發展可分成四個階段。

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發展初期，農業的比重很大，工業的比重很少，第三產業是幾乎沒有的。這個階段經濟基礎很小，不可能高速地發展，因為農業本身無法帶動整個經濟高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第一產業所佔有的比重開始下降，第二產業工業開始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第三產業的增長還是比較慢。這個階段的

經濟增長可以比較快，因為工業的增長可以帶動整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第三產業落後了，會“拖後腿”的。到了第三個階段，農業的比重繼續下降，工業的比重繼續增長，而第三產業就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所以在第三階段經濟仍然可以高速增長。到了經濟發展的第四階段，農業所佔的比重已經很少了，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比重都比較大，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增長就慢下來了。

今天的發達國家都處於第四階段，而中國正處於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變的時期，所以中國的經濟完全有可能在幾十年之內仍然以比較高的速度增長。

中國以甚麼因素來帶動經濟增長？必須找出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一個經濟增長點是住房建設。

住房建設能帶動很多行業的發展，鋼材、建築材料等等，在第二次大戰以後，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靠住房建設來帶動。那麼，中國的住房建設為甚麼不能帶動經濟的發展？主要是政策不配套，目前正在研究修改。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分期付款年期太短。過去，國內是沒有分期付款的，現在有了，但是年期太短。例如，銀行貸款予60歲以上的借款人，5年為期；60歲以下的，10年為期。目前，國內的家庭都有儲蓄，可是這筆錢是不能動的，老百姓稱之為“保命錢”。因為到了將來社會福利改革以後，看病、住院、孩子的學費、養老金等等，都是靠這筆儲蓄的。因此，必須把還款年期延長，讓老百姓可以不動用原有的儲蓄，以每個月的收入來還款。這個政策正在改，已經有些地方改為15年或20年，有的更長。

2. 二級房子市場要開放。甚麼是二級房子市場，就是指出售現在居住的房子。購買新房子價錢太高了，以樓換樓的形式，只須補差價，居民的負擔就減輕了。曾經講過，怎樣才是一

個好市長？應該是一個可以讓老百姓搬家的市長。如果市內的老百姓都可以小房換大房，舊房換新房，這個市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為什麼前一階段市場上不容許出售舊房子？那是因為，國有企業的職工是“公務員”，住的房子是從公家處買回來的，很便宜，如果剛買回來就可以轉讓出售，售價比買價高得多，職工就可以賺取很多錢，所以規定要等幾年後才可以賣。

這個想法是不對的。中國長期實施低工資制，當中就暗含一個條件，住房可以由國家幫助解決。假定當初不採取這種制度，而是把住房費用計入工資裡，職工工作那麼多年，憑個人的積蓄，也可以買房子了。所以，今天就讓職工可以出售舊房子，即使賺點錢，也可當作是多年來低工資制的補償，而國家也就不用再負擔其住房問題了。更何況每個職工一輩子只有一個機會，5年後才賣與現在賣的結果還不是一樣嗎？何不現在就讓他賣，讓房地產早點興旺起來。現在北京已經改變了，容許公房出售，不用等5年。

3. 興建一批廉價出租房。廉價出租房是社會公益事業，是讓買不起房子的最低收入階層住的，這樣可以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而另一個作用是給分期付款買房子的人留一條後路。分期付款的年期長，供款期間如果遇到變故不能如期供款的話，房子將會被收回。因此，必須建廉價出租房。至於建房的錢可以由政府出一部份，在社會上以彩票等形式籌集一部份，因為這是公益事務。

4. 建立城市軌道交通。一般大城市都是市區的房子價錢貴，郊外的房子價錢平。在郊外居住，醫院、學校、市場、商店等配套設施還易辦，但每天要到市區上班的交通問題就較難解決，目前在國內小汽車還未普及，即使普及了，交通擁塞的問題還是要解決。因此，要效法外國的大城市，發展城市軌道交通。現時，國內第一條

城軌鐵路正在修建，其他的地方應該及早考慮。

5. 減低稅率。對地區而言，國家規定的稅項沒法減，但地區的稅項可以減。目前國內某些地區，如江蘇省和徐州，已經把房屋買賣的稅收減低了。減稅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應該是減少的，但事實上卻是沒少反多，原因是舊房子、積壓着的商業房子都賣掉了，然後又再另建了新的房子出售。房地產業的興旺還帶動了建築材料、傢俱、消費品等的銷售情況，並且帶動了其他相關行業的同步發展，因此，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增加了。這個做法正在國內擴大，這樣一來，中國的住房建設就慢慢地帶動整個經濟發展。

現時國內出現了兩個新的情況：首先是，上海出現了一批“知識型的購房戶”，他們都是有文化的年青人，他們自己付出樓價的首期，然後向銀行貸款購買房子，再為房子配上傢俱，租予從外地來上海做生意的人。而屋主就可以用收到的租金來清還銀行的貸款，幾年之後，貸款清償，房子就屬於自己的了。另一個情況是，許多在市區內已經擁有房子的人，都會在郊外另購一間較便宜的房子，作渡假之用。

因此，住房業可以在未來 40 至 50 年內保證中國經濟的增長，它還帶動了許多其他行業，目前中國的住房太少，可以作為長期增長的一個增長點。

第二個經濟增長點是城市化。

目前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必須加快城鎮建設，且要建設中等城鎮的規模。因為小城鎮的建設有四個局限：1. 小城鎮不能建太高的樓，佔地面積太大，中等城鎮則可建高樓；2. 小城鎮的能源利用效率低，中等城鎮的能源使用效率較高；3. 小城鎮的環境污染缺乏管理，不容易控制，中等城鎮的管理較好；4. 小城鎮的第三產業難以充分發展，跟農村的關係很密切，而

中等城鎮可以發展第二和第三產業，同時，第三產業的就業需求高。這樣的話，城市化就將會長期地帶動中國經濟的增長。

第三個經濟增長點是開發西部。

開發西部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是有幫助的，但西部土地面積廣闊，資源豐富，人的收入低，要如何開發，仍在研究。必須首先做規劃，然後按照規劃來進行，由國家負責基礎設施的投資。至於如何吸引企業投資，則由市場行為來決定，只要有有關政策是可以讓人家賺錢的，就會有投資者；若沒有投資者，可以推出優惠政策。任何企業都可以到西部去投資，但都要通過經濟中心的安排，不能灑芝麻般的亂灑，要先培育經濟中心，然後向周圍擴散開去。從長遠來看，西部的開發也能夠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

透過對住房建設實行政策上的配套、城市化、西部開發等，可以預期，到本世紀中期，中國便可以成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一個有 12 億(可能不只是 12 億)人口的國家，能夠達到這一水平的話，中國的國力就是很強的了。

五. 就業問題

如上所述，就業問題已經擺在面前，包括城市下崗的人、農村走出來的人，如何解決？要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主要靠我們思想觀念的改變。

(一) 依靠民營經濟的發展來解決就業問題

國有經濟將來是長期存在的，國有的大企業經過資產重組以後變成是國有控股的，而其將來的發展是向高精專的方向的，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不需要太多的勞動力。因此，社會上便會有大量的就業需求，要靠非公有經濟來解決，靠民營經濟來解決。

曾經聽一個縣的領導人說，在縣內工作多年，體會可以總結成 4 句話：

無小不活——這個縣裡如無小企業，則會死氣沉沉，因為大工廠都停止生產了；無小不富——大工廠都停止生產了，國

家又沒有新的投資投入，縣裡的財政收入就全靠小企業來支撐了；

無小不快——如上所述，國家經濟每年增長 7%—8%，農業的增長能夠有 3% 已經是很難的了，國家又沒有大的投資，大企業停產，唯有依靠小企業幫助縣裡的經濟增長；

無小不穩——下崗的工人、每年的中學畢業生、進城來的農民構成很大的就業需求，要靠小企業來提供就業機會，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這四句話是千真萬確的。民營經濟的發展，解決了許多就業問題，如溫州、福建泉州都沒有下崗的問題，因為它們都是搞民營經濟，找工作就到民營企業去找。尤其是泉州，有 75 萬外地來的民工，仍然可以解決就業問題。

(二) 依靠城市化來解決就業問題

除了以非國有經濟來解決外，還可以利用將來的城市化，因為城市化建設一發展，社區服務就加強，老人、小孩、病人等社會福利服務的提供，都需要人手，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亦需要大量的就業人口。

(三) 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

要解決就業問題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除了城市以外，能否有其他的就業機會？應該有的。到一些農村去看看，農民最需要的是甚麼，部份農民最愛的是農用汽車，既可以載人，也可以載貨。道路條件比較好的，天氣比較乾的，可以跑運輸，以增加收入，假定可以分期付款方式讓農民購買這種農用汽車，則農用汽車的銷路將會大增，而農民的收入又可以增加。各地的農村有不同的需要，只要配合適當的政策和措施，就可以解決農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

曾到過內蒙的一個地方，一個農民利用設備的配合，增加了收入，然後擴大了農牧業，辦了一個牧場，還顧了 20 多人，這與政策有關。只要政策放寬，容許顧人便可以了。當時，個人建議他們，既要扶貧，又要幫富，如何幫？幫富不是為了他本人，而是為

了要向農民們樹立一個榜樣，讓他們知道，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有一個富裕的家、擁有大牧場、顧許多人。

因此，只要政策對頭的話，農業也可以有吸引力的，農民也不一定要流入城市。目前國內正出現一種“訂單農業”，就是由公司與農民簽合同，由公司負責找市場、找客源，由農民負責生產禽畜、農作物等等，然後公司按時來“收貨”，同時付款。這樣，農民的生產既可以有穩定的出路，又不用自己去找市場。農民有收入以後，就可以添置更好、更先進的設備，以更好地完成訂單，這樣，農村的經濟就可以增長上去了。所以，第一產業是仍然可以增加就業的。

(四) 民工潮的問題

民工潮是當前中國經濟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要有正確的看法，目前許多人對民工潮感到很討厭，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它有以下幾個好處：

1. 民工不是盲流，盲流是沒有目的的，民工是有目的的流動，目的是為了尋找個人的發展機會，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好處。

2. 若沒有廣大民工的外出，沿海地區的經濟能發展得那麼快嗎？高速公路、大樓是誰修建的？而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國家經濟的建設，這是第二個好處。

3. 民工外出打工都會把賺到的錢帶回家去，幾千萬民工每人每年帶1百元回家，每年就最少10億元從沿海地區流到內地農村去，既繁榮了當地的經濟，又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這是第三個好處。

4. 民工外出打工，思想觀念都得到了解放和轉變，八十年代初出來的第一代民工，到沿海地區打工，是為了賺點錢回家娶老婆；現在不同了，民工外出打工是為了學本事，技術、經營管理等都要學，這是巨大的人力資源投資，是幾千萬民工自己花錢培養自己，國家一分錢也沒有花。落葉要

歸根，出來的民工只要其中的幾分之一回去以後能創業，經濟就會發生變化，如湖南、廣西一帶的小商店、小企業、鄉鎮企業、私人企業都是到廣東打工的人回去以後開辦的。他們出來時是一個人，回去時是一伙人，出來打工後賺了點錢、有點技術、有點公共關係，就辦起小企業來了。昨天的打工仔成了今天的創業仔，今天的打工仔成了明日的創業仔，這就是一個好處。

5. 國內提倡婦女解放這麼多年了，雖然是有一定的作用，但自從打工妹出來以後，情況就發生了更大的變



化，那個地方打工妹出來多，風氣就開放得早；那個地方風氣最閉塞，打工妹就仍然未出來。別小看這些小姑娘，她們出來幾年以後，回家一趟，外表有了完全的改變，內心世界也同時發生了變化，她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外面的夫妻關係是怎樣的，外面的家庭是怎樣的，回到家裡就講開了，表姐妹們聽了以後都心動了，就一併的往外走，結果都出來打工了。

目前國內有些農村的婦女思想仍未開放，不習慣到外面打工，當地的發展就受到局限。但是有些農村卻在悄悄地起變化，農村婦女們的地位已有所解放，要衝破傳統的社會結構，要靠民工潮，要靠市場經濟。

對民工要有新的認識，有人說，民工都出來打工了，農村裡的田由誰人去種？曾做過調查，民工到外地去打

工，農田是由其他偏遠地區的農民來種的。目前國內農村的勞動力高度閒置，如果不讓一部份的農民出來，他們就不會好好的給你工作。一個地區的農民出來打工了，農田就由附近地區的農民來耕種，而這個地區所缺乏的勞動人口，就由另一個地區補上，這樣一段一段地補上去，農田就有人來耕種了，關鍵是如何有效地引導。一個人到外面打工，就可以維持全家人的生活，這樣，中國的經濟就可以發展了。

只要中國的經濟能夠發展，城市化得到實現，住房業有所發展，中國就會有繁榮的經濟前景，而且能夠應付加入WTO以後的挑戰，同時，中國的就業問題亦將會在經濟的發展中得到解決。

除了專題演講的部份之外，厲以寧教授還就與會者提出的相關問題作了獨到的回應，現整理如下：

一. 振興經濟是當前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中央亦多次明確表示會予以支持，那麼，你認為除了在博彩旅遊業的一些政策性的支持外，在澳的中資企業可以起到甚麼作用？

厲以寧教授回應：關於澳門的問題，我研究不多，因為這是第一次來澳門。澳門的發展，本人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善用人才，發展高科技，包括博彩業也可引進高科技，傳統的博彩方式可以保留，有的老人家會喜歡，但沒有高科技含量的博彩業，難以吸引新人，亦可能是沒有甚麼前途。更重要的是，發展高科技將來能使澳門出口產品有更大的競爭力。

二. 請問教授，中國加入WTO以後，澳門之窗口作用會不會減弱？澳門應如何面對此一機遇和挑戰？

厲以寧教授回應：中國加入WTO對澳門很有利。因為澳門經濟發展，背後是依托中國大陸的整個經濟，中國加入WTO之後，大陸的經濟增長會走上一個新的台階，這將對澳門經濟的

背後支持更強。另一方面，中國進入WTO之後，國內的資產重組和開發等，需要更多的境外投資介入，那就給予澳門企業很大的新的商機。另外，澳門要發展經濟，如發展高科技，內地的產業、科研機構、高等學校，都可以各種方式加快與澳門相關部門的合作。本人相信中國加入WTO後對澳門經濟也是有利的。

三. 根據制度經濟學理論，制度因素和觀念的調整對現代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從宏觀層次決定了資源配置的利用效率，制度的完善及創新涉及社會觀念、人的行為的適應化調整，但這往往需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較大的轉變。按照厲教授的看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達至與國際規範高度連接程度，是否還需要一段頗長的整合期？

厲以寧教授回應：中國的經濟要跟世界市場接軌，的確是比較長的過程，難以一下子就解決。舉兩個例子：

1. 即使加入WTO後，A股市場不對外開放，原因是為了保護國內的高新企業，和廣大的股民的利益，假定開放了，國外的一些大機構一炒，就很容易把錢轉走了，中國的經濟怎辦？所以外來投資是可以的，但是A股市場不開放，而在B股市場可以炒。等到幾年以後，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外匯管制取消了時，A股市場才可以開放。國際接軌的目的是為了有利於中國企業現代化。在初期保持一定距離，將來再接軌，也是為了上述的目的。第2個例子，外匯管制不能取消，中國外匯儲備有1千5百億美元，還算不少，但對中國有12億人口來說，卻不算多，假定外匯管制一取消以後，老百姓把人民幣都換成外匯，這時中國的經濟受得起嗎？這將中國經濟拖跨，對誰也沒好處。所以必須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從最大程度有利於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出發，也得保留一個過程。

四. 澳門的中資企業不少是國營企業，

它們在澳門經濟領域中的比重很大，發展狀況對澳門經濟之影響亦相當大，但據了解，它們當中，有相當部份現在的日子並不好過，更加談不上促進澳門特區經濟的振興，請問，你認為澳門中資企業的前景將會如何？應如何改革？出路何在？

厲以寧教授回應：首先講，中資企業是國有企業，既然國內的國有企業都在進行體制上的改革，本人相信，澳門的中資企業亦同樣要在體制上進行改革。究竟體制改革的過程如何進行，是要根據每個地方、每個部門的實際情況而定，這點是可以肯定的。其次，中資企業仍然要在澳門發揮一定的作用，目的是為了使澳門經濟趨於穩定，保證澳門經濟長期的發展；若說中資企業全退出澳門，是不現實的，而且對澳門的經濟也沒有好處。但我們相信，中資企业在體制改革後，一定能在澳門經濟中發揮更好的作用。

五. 大西北的開發，能否給澳門帶來機遇？為甚麼？

厲以寧教授回應：大西北的開發，能否為澳門帶來機遇，主要是看你選擇甚麼方向，不能籠統的說大西北的開發對澳門帶來甚麼機遇，機遇是要你去投資才有的。我在廣州講過一句話：“我們應積極而謹慎地參與國有企業資產重組”，積極的意思是，國有資產重組中，歡迎外商的介入，能夠組成多元投資，但為甚麼要謹慎，這是從港、澳人的利益來考慮的。例如在香港、澳門，真正考慮那方面是有利的，你能夠參與的程度多少，能夠為你帶來的福利多少等，都得有一個計算，不能盲目，應選擇你有優勢的項目，且對當地情況有了解、認識。所以在這情況下，就需要積極而謹慎了。

六. 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問題在於大型國有企業。這裡因素很多，也不完全是企業的生產效益不高或是投資主體不明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政策負擔”，這是過去重工業優先政策所

造成，不改革政策負擔，生產效益再高，企業的總效益也會被拖慢。由於現在國家財政有限，企業積累也很有限，企業勞動力本身儲蓄也不多，在這樣的背景下，請問如何解決“政策負擔”？

厲以寧教授回應：在國內企業改革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總結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面，要考慮到，將來國有企業中某些骨幹企業，是仍需要國家控股的。這是否跟過去的差不多？不是，董事會組成後，董事的組成是多元化的，即使大股東，在投資的決策上也要跟其他董事商量，以避免盲目的決策。另外，下一階段，從7月1日起，中國的會計法修正案將實行，這對帳目要求非常嚴格，透明度要增加。國有企業在過去存在許多問題，包括上市公司的問題，是因為它的透明度不高，造成許多不準確的地方。新措施有好處，把整個企業都置於公眾監督之下，特別是上市之後，上市公司的報表必須準確。經過這一改革以後，國有經濟仍然會在控股企業中發展，國有經濟在中國將長期存在，但百分之百控股的國有企業只會在少數行業中的特殊情況下存在，大多數行業是屬於混合所有制的，重要的骨幹企業是國家控股的，這是將來的前景。

七. 特區政府在發展經濟策略的中期目標是以旅遊博彩業的發展，去帶動其他行業的振興。您對該經濟策略的可行性有何意見？及其利弊如何？

厲以寧教授回應：澳門將來主要以甚麼行業為主？本人認為，博彩業是澳門的傳統，將來亦會佔有一定的比重，但今後的澳門還是要從高科技着手。每行每業都有高科技，對國內有效，對澳門同樣是有效的。每個行業能夠找到高科技所在，有所突破，這個產業就有前景。

八. 請結合前幾年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談一下“經濟持續增長”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問題。

厲以寧教授回應：應該講，全世界的宏觀調控都是必要的，主要的問題是調控時間過長一點，幅度過大一些，但這並不證明調控是不對的。假如沒有前幾年的宏觀調控，通貨膨脹率在20%左右的話，以後的經濟怎樣能發展？中國經濟能否像東南亞其他地區一樣經得起金融風暴的衝擊？所以，首先應肯定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時間是否過長，97年能否轉向更好一點等問題是可作討論的。在目前情況下，中國會否再發生通貨膨脹？最少在目前仍看不出這個現象，中國現在年年擴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會否跟一般發展中國家一樣出現財政危機，是不會的。首先，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一般發展中國家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是沒有充足的物質儲備的，但中國的物質儲備是很充足的，都存在倉庫內，不會被搶購，所以在一段時間內是不會出現財政危機的。其次，中國發國債，主要是用於建設，中國法律規定國債不能用於彌補經常性開支，而發展中國家發國債則主要用於彌補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是一個無底洞，這樣下去，會出現經濟問題。中國是不會的，發國債是用於建設費用，要形成生產能力為還債作準備。第三，發展中國家許多是政局不穩定的，老百姓不信任政府，如搶購商品等，害怕新政府上台後不承認舊的決定。中國絕不會出現此問題，因為中國的政局穩定，中國人民信任政府、信任人民幣。

九. 如何理解把教育作為一個產業來抓，這是否也是可理解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部份？

厲以寧教授回應：本人認為，中國要發展教育，把教育作為一個產業來抓，主要意思是，教育要講經營，要講管理，要重視它，讓教育本身能夠以更好的速度完全發展。教育產業化絕不等於教育商業化，有人誤解了，認為教育產業化就等於教育商業化，以賺錢為目的，這是錯誤的。中國教

育法規定，教育是非營利性的。中國為甚麼要大力發展教育產業，是為了提高國民的素質，給人民專業結構的調整、轉變，以適應將來經濟發展的需要。還有一點，中國目前發展教育，還可以推遲就業年限，讓初中生升上高中，就業年限就可推遲三年；高中生大部份能上大學，就業年限就可推遲四年，避開目前的就業高峰期，這將可為長遠的經濟增長作準備，為提高國民質素作準備，也為當前推遲就業作準備。

十. 厲教授，去年底及最近的大型國有企業(如中石化)海外招股屢遭冷遇甚至失敗，這樣的“靚女”也嫁不出去，請問對於目前國有企業改革攻堅戰有何影響？國企改革下一步出路或思路何在？

厲以寧教授回應：究竟對國外上市的國有企業該如何評價？不能籠統說國有企業在某地的情況如何，應按各個企業分析。的確在國內會計法修定案仍未實現之前，許多會計帳目是不行的。現在出現一種情況，就是廠的領導人命令會計員做假帳，國內今後嚴格禁止，凡是會計員奉命做假帳，不僅會計員要處分，指示他的人更要處分，規定是很嚴格的。那個會計從業員幫助做假帳，他的營業資格就將被取消，相信這對提高透明度有好處。國外對上市企業不相信的另一個原因是，覺得國內企業的效益不好。這種情況，主要是由宏觀形勢來決定的。98年12月份，在香港的一些商人問我，香港的企業甚麼時候能夠解困呢？這個問題跟我在國內聽到的問題是一樣的，國內的人會問，國有企業甚麼時候能解困？可以看到，宏觀形勢不好，市場銷售不好，導致任何企業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銷售困難，所以國有企業不好是跟整個銷售環境有關的，香港股市在下跌，所以許多企業也在下跌。故此，一方面要考慮宏觀形勢，另一方面我們應按每個企業來分析情況，不能籠統地說國有企業在某地的情況如何。

十一. 內地國有企業內部職工持股試點工作的發展情況？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企業可否實行內部職工持股？

厲以寧教授回應：首先，內地國有企業內部職工持股的情況，有些地方正在進行試驗，有些地方正在進行討論。有些地方正在研究可否成立一個組織，如職工持股會的形式，由工會代為安排有關職工持股的事項，如職工持股以後，統一由職工持股會代管，三年以內不得轉讓。另一種情況是，有些地方正在探討，職工所持有股份的比例應為多少？太少或太多都不可以。還有一個看法，職工持有股份後，也不會提高他們的積極性，他們只會把股份賣掉以賺取一筆收入，他們把股份賣了以後，就跟沒持股一樣了。對這個問題，我們要這樣看，職工持股假定是作為一種制度，應該在企業發展的情況下，不斷增發新股，新股推出，新人又可買到，這樣可能比較有效，但這問題還是在探討之中。

其次，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企業可否實行內部職工持股，這個問題由他們自己決定。

十二. 境外(中資)企業和國內合資企業如何實行股份制，怎樣解決個人持股？

厲以寧教授回應：個人持股問題，國內只是說經過批准以後，有些在試點，現在仍沒有一個正式的規定出來，所以部份國有企業用股權獎勵方法來搞持股。至於這個問題下一步該怎樣做？隨著這個討論的深入，可能這方面會有新的規定出來。給予公司的個別科技人員股權，究竟以甚麼方式給予，股權從哪裡來？是採取企業回購的方式呢？或是在企業擴大的過程中，用配股的方式呢？還是用其他的方式呢？這些都仍在研究之中。

十三. 請問教授，澳門賭權開放的步伐怎麼走，是穩中求開放，還是加速開放求變？

厲以寧教授回應：本人相信，澳門特區政府會收集大家的意見之後，作出妥善的安排的。

“內地、澳門經濟合作現狀及未來前景”座談會紀要

為了促進本澳與內地的學術交流，加強本澳各界人士對國內經濟狀況的了解，本中心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八日上午邀請本中心名譽學術顧問、我國經濟學權威厲以寧教授與本中心成員及本澳部份經濟、學術界人士進行內部座談，出席是次座談會的有梁維特、楊允中、高展鴻、鄭國強、陳俊拔、陳健霞、王承舜、甘樂年、李洪光、張作文、許昌、陳守信、陳煒恆、黃善文、劉錦釗、蕭志成、關鋒等。



座談會由梁維特會長主持，與會者就澳門經濟現狀、內地與澳門經濟合作現狀及未來前景等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意見和建議。綜合整理撮要如下：

一. 與會者對澳門經濟現狀的意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 有關澳門元的法定貨幣地位方面：

1. 有與會者表示，澳門元的使用範圍狹窄，內部需求不足，要維持澳門元的流通成本非常高，據估計若減少這部份支出，將可為澳門政府行政支出節省5-15億元。這是因為澳門元內部需求不足，銀行體系內積壓了大量的澳門元，澳門金融局為了保障銀行業界的利潤，發行“澳門元金融票據”，以吸納銀行體系內的過剩資金，因而需要付出一定的利息成本。故此，有需要考慮澳門元是否應繼續維持存在。

2. 亦有與會者認為，澳門元的存在

有其重要價值，包括：

- (1) 儘管維持澳門元的流通，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是如果澳門沒有獨立的貨幣，當面臨經濟窘境或外來的金融風暴的時候，就將會缺乏可控制的金融手段和機制，以渡過難關。
- (2) 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維持澳門元的流通需要付出成本，但是澳門元的存在並不是造成經濟不景的原因，是具有經濟效益的。
- (3) 澳門元的存在是“中葡聯合聲明”、《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是澳門獨立形象的標誌，具有無形資產值。建議金融管理局繼續發揮推廣作用，提升澳門元的地位，以擴大需求。

(二) 其他經濟領域方面：

1. 有意見認為，過去，由於工業發展迅速，勞動力需求大，當時引入大量低薪外勞，解決了本地低下工種的勞動力需求；而目前的主動引入人口，卻不是市場機制作主動的。
2. 有與會者表示，澳門是一個旅遊城市，在客觀方面，遊客來澳旅遊、消費，是以渡假為主，追求澳門寧靜、優閒的一面；而在主觀方面，我們希望把澳門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國際化的金融中心。兩者之間，應如何平衡？澳門的城市發展應該如何定位？
3. 有與會者表示，內地宏觀調控使澳門經濟加快陷入低谷，在澳“中資企業”的問題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澳門經濟，同時，澳門經濟中存在勞工問題、黃色事業問題等。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夠完滿地解決，有可能導致在未來出現合併香港、澳門的建議，這個

建議可能在10~20年內形成，但對澳門社會沒有好處。澳門雖然是個細小的地方，但是“一國兩制”是否成功，仍是一個大問題。

4. 有與會者表示，博彩業是澳門經濟的主導產業，目前，是獨家專營的。未來的發展路向如何？應首先研究並確定，博彩業是否應該繼續維持獨家專營。在確定了博彩業的經營權限之後，未來的博彩業經營者(無論是獨家或者是多家經營)都將會根據市場發展規律，自行研究並決定是否需要把高科技引進博彩業，以及應採用哪一水平的高科技等問題。

二. 有關澳門經濟發展路向的幾種意見和建議：

(一) 關於引入高科技產業的問題：

1. 有出席者表示，澳門是一個自由經濟市場，如果要發展高科技產業，應該先創設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環境，例如，首先由特區政府推動並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然後，由投資者出謀獻策，使高科技產業得以發展。有人認為，澳門人的知識水平很低，總體教育水平不高，根本沒有高科技方面的人才。但據了解，目前，本澳有相當數量的大學畢業生仍處於失業狀態，雖然他們並不是全部擁有高科技知識，但只要其中一部份擁有相關知識的人才，經過培訓後，便可以參與有關產業的工作。認同厲教授有關在博彩業引進高科技元素的建議，澳門應發展適合於澳門的科技產業。

2. 與會者認為，對整體經濟而言，在澳門的產業中引入適當的科技是必須的，特區政府和投資者都應該予以重視和配合，否則，澳門的經濟將難以得到更大的發展。

(二) 關於開發電子商貿方面：

1. 與會者同意，透過互聯網進行電子商貿，有助於把澳門的細小市場與國際市場連結，同時，將有

- 助於改善澳門市場狹窄、需求不足的缺陷。
2. 有出席者認為，澳門電訊的專營權(延續10年)問題，將可能成為澳門電子商貿發展的障礙之一。由於固網收費是關鍵的電訊業務之一，屬於專營合約內容，其相對較高的收費，增加了企業建立網上交易的成本，限制了本澳電子商貿的發展。
3. 亦有與會者表示，在電子商貿方面，目前本澳仍未有任何法例的制定，缺乏法律保障。

(三) 關於解決內部消費不足問題：

1. 有關內需不足，零售業面臨困境的問題。有與會者認為，澳門的零售業投資者應將目標客戶從本澳居民轉向來澳旅客，因為據社會文化司司長估計在2000年來澳的旅客數字將會上升至800萬人次。因此，及早制定經營策略，吸引旅客在澳消費才是經營上策。

三. 有關內地、澳門經濟合作方面：

1. 有與會者建議考慮，內地可否透過某些政策的制定，容許澳門的銀行經營人民幣的業務，放寬對人民幣在港、澳流通的限制，把人民幣在港、澳的經營和運作系統化、機制化？
2. 亦有與會人士認為，可考慮在內地、港、澳三地的金融體系、金融政策和機制都逐步調節好、改善好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建立一種有利於三地經濟發展的統一貨幣。

最後，厲以寧教授和與會者分享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意見：

一. 港、澳之間存在着8個差異之處：

1. 澳門的法治環境、投資環境不如香港的健全，因葡國人的管治比英國人差。
2. 澳門企業發展落後於香港，現時澳門的經濟發展狀況只相當於60年代的香港。
3. 澳門人的觀念與香港不同，例如對高科技、世界經濟新潮流的敏感性，對高科技產業、市場經濟中融資的方式、專業人材的重視

等觀念均遜於香港。

4. 香港有較多的土地(如空置的島嶼)可供發展，而澳門土地資源有限(只能依賴填海擴展土地)，發展空間較香港少。
5. 澳門的人才素質相對較低，高層次的人材較少。
6. 澳門比香港更傾向於內地，這是好事，更愛國，但具有依賴性。
7. 從社會文化方面看，澳門較傾向於傳統的一面。
8. 中央給予澳門最大的政策優惠是容許發展博彩業，而香港則沒有博彩業(賽馬除外)。

二. 澳門經濟發展路向：

(一) 企業發展方面：澳門適合於中小企業的發展，當然，不排除大企業的存在，中小企業有其優點，發展空間較大。建議成立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發揮以下三方面的功能：

1. 技術、投資諮詢服務；
2. 人材的供給；
3. 法律諮詢及協助。

而這個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對澳門經濟發展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1. 人材中心：各中小企業都有人材的需求，由企業自己招聘，難度較大，由中心統一培訓及提供，人材的招聘問題更易解決。
2. 技術中心：新技術的應用，包括培訓、推廣等，中小企業都缺乏能力；由中心統一安排，包括人員調配、培訓等，有助於新技術的引入。
3. 法律服務：中小企業的經營，都可能會面對許多法律糾紛；如知識產權等，訴訟費用相當昂貴。中心可以提供相關的服務，如諮詢、律師的提供等，這將有助於中小企業解決法律上的難題。
4. 市場訊息的供給：市場訊息不斷變化，若各企業分別獨立去收集市場訊息，成本太高；通過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安排專人去收集，並提供給有需要的企業，可以減低成本。
5. 投資資訊的諮詢服務：企業希望到境外投資，如參與內地的企業

重組、西部開發等，都需要足夠的訊息作參考，由企業自行派員作實地調查、了解、收集訊息成本太高，由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向有需要的企業提供服務可減低成本。

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應以服務中小企業為主要方向，協助中小企業的發展。另外，澳門的企業應透過與葡萄牙的特殊關係，建立起與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東帝汶等曾經是葡屬地的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服務中心亦應在這方面提供協助。

(二) 技術創新方面：各行各業都應有高科技，博彩業也應有高科技，傳統的人喜歡傳統的博彩形式，年青一代喜歡新的形式，應提供不同的選擇。各行業都有不同的發展空間和發展餘地，應該發展適合於本行業的高科技技術。在這裡，高科技的“高”，是具有“適用程度”之意，應體現為“適用於澳門的高科技”，要適合於澳門經濟發展的層次。

三. 澳門與內地經濟合作方面：

從整體上來看，澳門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是毫無問題的。澳門回歸前，經濟合作就已經有一定的成績，回歸後，合作的條件將會更好。但有一點想提的是，有建議走向一體化的形式，如歐盟的形式，以目前的條件來看，是不行的。歐盟的形式，有四個特點：

(一) 貿易自由化：歐盟的貿易自由化是分兩個步驟完成的，第一步是內部關稅的降低；第二步是內部關稅的取消。這個暫時不適用於內地及港澳地區。首先，港澳是自由港，有獨立的關稅制度。其次是，中國即將加入WTO，現正明確在加入WTO後會降低關稅。但是，如果對外徵稅，而對港澳不徵稅，這就會違反WTO的規定，是不可行的。

(二) 投資自由化：歐盟國家可做到投資自由化，但在內地和港澳之間，目前還不可以。澳門及香港到內地投資是非常歡迎的，但是，目前內地的外匯管制仍不能取消，一旦取消，外匯就會流失，這將對中國的經濟造成不良的影響。故此，內地的企業要取得

外匯就相對困難，到澳門投資暫時是不現實的，還是港澳的企業到內地投資，與內地的企業合作的方式較好。

(三) 人力資源流動自由化：人力資源流動自由化在內地和港澳間，目前絕對不能實施，因為內地農民人口太多，只能放寬對內地專業人材流動的政策。

(四) 貨幣一體化：從政治上考慮，澳門元的存在是必要的。澳門元的存在是“一國兩制”在澳門實施的具體表現。”一國兩制”剛在澳門落實，澳門元便被取消，對澳門會造成影響，對內地同樣會有重大的影響。澳門元的需求量與澳門的經濟實力有關，一個地區的貨幣是否受外地歡迎可顯示出該地區的經濟實力如何，澳門的經濟實力不強，出口太少，澳門元的需求

便少；故此，澳門應首先加快經濟的發展，擴大出口量，讓澳門的經濟水平增強，以擴大澳門元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可以考慮由特區政府設立外匯調節基金，若果澳門元出現困難時，可透過外匯調節基金幫助解決問題；此外，亦可以借助於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協助解決在澳門元的兌換上所發生的問題，發揮調劑兌換的作用。有關人民幣業務的經營問題，目前人民幣仍受管制，要對外開放人民幣業務是較困難的。

四. 有關澳門的其他具體問題：

(一) 人口問題：澳門人口雖然只有40多萬，但澳門面積不大，人口密度太高。同時，人口素質相對較低，應注重人口素質的提高。

(二) 旅遊特色問題：澳門以旅遊業為

主，具有自由港的特點，建議可發展成一個購物中心，可以“價廉物美”為特色。澳門除了要吸引遊客來澳觀光遊覽外，還應吸引遊客在澳門消費，這才可促進澳門經濟的發展。

(三) 中資企業問題：中資企業在澳門的存在是必要的，在歷史上亦為澳門的經濟發揮過作用，不應予以絕對的否定。如果中資企業全部退出澳門經濟市場，澳門的經濟狀況將會如何？這是不符合客觀現實的。中資企業是內地與港澳的橋樑，澳門回歸後，希望在澳中資企業透過內部改革，同時多與本地企業溝通和合作，以達到促進澳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目標。

總體而言，澳門經濟的關鍵問題是必須改革，具體表現是，為適應經濟形勢的發展，企業經營觀念必須改變。

“《澳門基本法》與特區政府《施政報告》”座談會紀要



《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依據，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是《澳門基本法》頒佈七周年的日子，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亦剛在三月二十九日發表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為了探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首份《施政報告》如何能體現《澳門基本法》的基本原則，以及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零年《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交換意見，本中心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下午三時三十分，假

本中心會議室舉行了”《澳門基本法》與特區政府《施政報告》”座談會，出席的本中心成員有梁維特、楊允中、劉本立、余健楚、關恩賜、高展鴻、鄭國強、李雁玲、梁小牧、黃義滿、曾澤瑤、劉健豪、王樺、鄭玉球、陳俊拔、陳健霞。此外，會議還邀請了部份社會人士參與座談，包括有：劉羨冰、李沛霖、彭為錦、容永恩、劉藝良、蕭卓芬、劉品良、彭小燕等。

會議由本中心會長梁維特先生主持，與會者就會議議題各抒己見，綜合整理摘要如下：

楊允中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了一百多天，運作狀況良好，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今次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次施政報告，是根據《澳門基本法》第65

條的授權和規定而進行的，它一方面體現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施法三者之間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又相互制衡；另一方面亦可以體現到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行政兩大權力架構在互相配合、支持，又相互制衡的過程中，如何總結出一套能夠適應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有效的運行模式和規律。

是次所發表的《施政報告》，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首次發表的政府工作計劃，整體思路是可以接受的。由於本年度的部份施政工作在去年已經由中葡聯合聯絡小組進行了討論並且通過，故是次施政報告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同時，為了確保剛成立不久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得以正常運作，因此，不可能期望是次施政報告能夠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承諾。我們寄希望在明年的《施政報告》中，能夠體現更多新的思路。

另一方面，昨日是《澳門基本法》頒佈七周年的日子，但是本澳的有關紀

念活動不多，尤其是特區政府方面，更未見有任何相關活動的舉辦。建議特區政府在今後的日子裡，能夠多注重有關《澳門基本法》的宣傳、推介活動，強化《澳門基本法》的形象。因為《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的法律依據，在未來五十年內都不可能有重大的改變，因此，完整、正確地理解《澳門基本法》是一項現實的、長期的課題。以《澳門基本法》為基礎，以其他相關法律的實施作配合，將會使到澳門特區的建設更具效益。

回歸前，澳門居民盼回歸；回歸後，澳門居民盼發展。回歸並非只意味着澳門回歸祖國，更重要的是，要在回歸後把澳門建設得更好。讓澳門特區更好地發展，不應該只是幾個主要官員的責任，而應該是全體澳門居民的責任，每一位澳門居民都應該為建設澳門的未來而共同努力。

李沛霖

《澳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具體表現，是治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礎。在首份的《施政報告》當中，可以體現出《澳門基本法》的基本精神。

在澳門回歸前，《澳門基本法》未正式成為治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依據，我們已不斷地進行宣傳、推廣工作；在回歸後，《澳門基本法》成為了治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礎、前提，是各類法律的依據，故更應該大力加強有關的宣傳、推廣工作，讓澳門居民更深入地認識和了解《澳門基本法》。

《澳門基本法》頒佈七周年紀念日，同時是澳門回歸祖國之後的第一個紀念日，更具意義，應該藉此機會，加強有關的宣傳、推廣工作。目前，澳門的民間社團發揮了較大的作用，進行了各類型的宣傳、推介工作和活動，例如澳門中華教育會就準備繼續印製《基本法漫畫集》，以作澳門小學的教材。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澳門基本法》的宣傳推廣工作應該長期堅持下去，這既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也是澳門廣大市民的責任。特區政府應從社會和教育兩個方面整體考慮如何

做好宣傳、推介工作；而各民間社團亦應視乎實際的情況，舉辦各類型的活動，以便讓廣大市民更好地認識和了解《澳門基本法》。

特區剛成立不久，澳葡政府遺留下來種種有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受到過去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議決的限制，故難以期望特區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能有很大的突破和承諾。寄望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運作以後，特區政府的第二份《施政報告》能有一個更大的飛躍。

劉本立

在落實“澳人治澳”的過程中，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方面都必須注重其思維方式的改變。以立法為例，現時的立法者中不少都是葡人的班子所培養出來的，其思維方式很可能仍存在以往澳葡政府時代的思維方式，那麼，這一套的思維方式，如何能夠與《澳門基本法》的基本思想吻合呢？

劉羨冰

個人認為，《澳門基本法》已不應只是處於宣傳階段，因為現時已是《澳門基本法》真正實施的過程中的第一步，社會各方面都應在各自的領域內，作出新的努力。

對法律條文的認識和了解，是把文字轉化為可行的措施，要真正落實並不容易。《澳門基本法》的實施，就是要把文字的東西轉化為可行性的東西，而所謂的可行性東西就是要保護澳門居民的基本權益。“一國兩制”的實施成功，仍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特區政府的成立，是一個根本的變化，然而，目前政權雖已正式移交，但人的思維方式又是否有根本的改變呢？

《澳門基本法》除了要作形式性的宣傳活動之外，個人認為應該更加注重實質性的研究。對於《澳門基本法》的學習、認識、理解仍有很長遠的道路要走。

高展鴻

對於《澳門基本法》的學習，應該提昇至更高的層次。其中，應該加強

公務員，特別是高級公務員對《澳門基本法》的學習、認識和理解。

鄭國強

首份《施政報告》中，對澳門的前景描繪得非常美好，但對於如何實現此一美好前景，則欠缺具體政策和措施。目前，社會期盼着在特區政府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中，可以尋找到答案。

現今世界經濟不斷變化和發展，對澳門的經濟發展有着重大的影響，而對於澳門的經濟難題，澳門居民所需要的果實，但是，這並不是容易得到的。

澳門是一個細小的地方，在公務員隊伍裡，如何能夠確保“親屬回避制度”、“利益回避制度”得到真正的落實？又如何能夠使此二項制度與“用賢不避親”的原則相結合呢？公務員應從澳門的整體利益出發，以《澳門基本法》來規範自己的行為。

劉品良

同意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起步較好，但經濟的嚴重不景氣仍困擾着整個澳門社會，雖然中央政府已經在一些具體政策上對澳門的經濟發展給予支持，但要扭轉澳門經濟持續六年陷於低迷的狀況，是不易為的。

個人認為，首份《施政報告》穩健有餘，但氣魄不足，應該更具前瞻性。對於公務員的問題，當然應該是以平穩過渡為原則，但對於存在重大問題者，亦應予以嚴懲，不能只單方面強調平穩。

對《澳門基本法》的學習、推廣工作應繼續加強，尤其是公務員隊伍，更應大力推動學習、認識《澳門基本法》，當中，中高級公務員是《澳門基本法》的執行者，必須首先強化他們對《澳門基本法》的認識。

梁維特

首份《施政報告》中曾經八次提及《澳門基本法》，可見它是以《澳門基本法》為基本依據的，當中亦曾提及過有關《澳門基本法》的宣傳、推廣活動。

個人認同，在回歸後《澳門基本法》

是澳門居民的生活保障，而目前我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研究如何開展全面的推廣活動，使澳門居民認識到《澳門基本法》所賦予我們的保障，是我們生活的保證。

劉本立

在未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和財政運用的執行和落實過程中，應建立問責制度。

劉品良

雖然今年的財政預算比往年減少了，但實質上是沒有少的，因為過往澳葡政府每年的財政預算都是過份夸大的，造成了許多的浪費，如果能夠好好地運用，今年的財政預算應該是足夠的。

特區政府應該提高施政的透明度，加強傳媒的監督，加強輿論的監督。同時，特區政府還應從澳門的整體利益出發，考慮如何能使澳門的發展更符合澳門的實際需要。

劉羨冰

有關新移民來澳將會對澳門社會造成影響的問題，既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亦是民間的責任，澳門社會應該共同承擔。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澳門教育體系當中，10歲以下的學額需求較少，有較多的學額空缺，因此，10歲以下的學童來澳，對澳門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應該會較少，他們可以填補空置的學額。但是，這樣將會帶來另一個社會問題，如果這些學童單獨獲得審批來澳定居，而其母親未獲審批而須在內地生活，則這些學童來澳以後的生活就會無人照顧，這將會為澳門社會帶來更多的青少年問題。澳門是一個以賭業為主的地區，與賭業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口約有16萬人，澳門43萬多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相當大，而這部份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對青少年的影響最大。同時，據資料顯示，青少年問題較多出現於缺乏母親的單親家庭。因此，單獨審批10歲以下的學童來澳，將會為澳門社會帶來更多的青少年問題。1979年，大量學

童湧入澳門，對澳門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特區政府應該關注學童來澳的問題，建議成立跨部門小組，制定具體的政策和措施，避免歷史問題再出現。

在財政預算方面，財政制度應予改革，每年的預算都要符合實際需要，把公帑用在有需要之處，避免造成不合理的浪費。

鄭國強

世界上的其他賭國與澳門是不同的，它們都有社會分工，以拉斯維加斯為例，它只須關注博彩業的發展，而有關如教育等的其他社會問題，會由其他周邊的城鎮承擔，不須要拉斯維加斯承擔。而澳門的博彩業所衍生的問題，對青少年的影響極大。

蕭卓芬

政府施政過程中，檢查、監督制度很重要。如醫療問題，政府建議要聘請外國顧問進行研究，如果這是必須的，應該要向市民介紹，使市民了解為甚麼有這樣的需要。

另一方面，建議特區政府與企業合作，為曾經吸菸的康復者重投社會提供機會。如在路環聯生工業村設一生產線，配合夜間教育和住宿服務，對康復者進行職業培訓和教育，以助其更好地重投社會。

鄭國強

《施政報告》未能回應市民求變心切的訴求。當中，存在着以下幾個問題：

1. 未有提及各自治實體的財政預算，如郵政局；
2. 未有提及有關公務員徵稅的可行性研究；
3. 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無提倡“優生”；
4. 既然特區政府明白到旅遊業成為了振興澳門經濟的突破口，及特區形象的其中一個有效的宣傳工具，但是，面對澳門存在許多坑害遊客的短期行為，黑貨、假貨的一條龍運作等問題卻視而不見，而結果是造成有些人有持無恐。

以上的問題，希望在今年特區

政府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中，能夠予以跟進和改善。

關恩賜

目前，《施政報告》已經制定好，應該考慮的問題是如何落實執行。

澳門的專營問題，必須解決。如澳門電訊有限公司的獨家專營，在無競爭的環境下，使到澳門地區的電訊服務收費處於全球收費水平的相當高的地位。

高展鴻

回歸以後，澳門社會對公務員的期望都是非常大的，公務員隊伍承受着比較大的壓力。然而，價值觀、思維方式的改變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對於公務員隊伍內存在着的問題，如果是歪風，應予以批評、施予壓力；但對表現良好者予以表揚、讚賞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將有助於正氣的樹立。

彭為錦

本澳居民中的失業家庭，由於生活經費、教育經費的問題，迫於把家屬送返內地生活、居住，如果目前的經濟現狀不改變，新移民的問題有可能會造成單親家庭問題，但亦有可能不會。因為來澳的子女，可能會由於經濟問題，被迫於取得居民身份證後，再返回內地生活，接受教育。

《澳門基本法》早在七年前已頒佈，雖然現在才正式實施，但澳人應早有準備。特區政府架構中的主要官員長期在澳門生活，雖然都應予以支持、體諒，但是否可以有更高的要求。經濟的發展是不可能突變的，穩健是必須的，但亦應有積極的態度。我們知道，任何計劃的訂立，一般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完成，可能只是完成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少，而澳門的經濟已經衰退了七年，澳門居民對特區政府都寄以極大的期望。對於《施政報告》首先應予支持，但亦應有更高的要求。

關恩賜

93年起，日本是澳門的主要客源地之一，但旅遊業界以低廉的團價吸引遊客來澳後，卻用種種方法坑害遊客，把

遊客嚇走，這些情況不改變，旅遊業將無法發展。

如果澳門的公務員和服務性行業的從業員能夠做到“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地考慮消費者的需求，並提供切合其需求的、良好的服務，則澳門的旅遊業將會有更大的發展，同時，會增強投資者和再投資者在澳投資的吸引力。

容永恩

回歸以後，政府部門與社會的溝通已經加強了，社會上的問題，政府有關部門都會通過各種渠道來收集，許多問題都已經知道了。而一個值得大家參詳的問題是，在現階段是否適合繼續對各政府部門不斷地施加壓力呢？

彭為錦

不是施加壓力，而是必須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因為現在澳門的狀況，應該在七年前已經可以預計到了。個人認為，有許多問題，如勞工問題，澳葡政府未有理會，而現今特區政府是必須予以正視的。澳門現存的一些問題，只要特區政府重視，是應該可以解決的。

鄭國強

外勞政策對社會的影響很大，由於經濟的問題，居民消費已北移，影響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最終影響社會的安定繁榮。雖然，特區政府有關外勞問題，但仍欠具體的措施和政策。

劉藝良

回歸以後，澳門的社會關係良好，中央對澳門的支持亦很大。

對於《澳門基本法》的宣傳、推廣工作，應推及內地的同胞，因為，目前在內地的居民，包括高級官員，對《澳門基本法》的認識都很少，亦不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有關的宣傳、推廣工作，不應該只限於某個紀念日才進行，亦不應該只限於形式上的紀念活動，而應該加深澳門居民對《澳門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

澳門居民對特區政府的期望是非常

大的，但是要有適應期和過渡期，應給以時間。

香港回歸與澳門回歸不相同，香港回歸處於經濟高峰期，但回歸後，經過金融風暴、禽流感等的洗禮，社會狀況從高峰墮下。同時，雖然香港的18萬公務員全部平穩過渡，但特區政府的施政困難，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不及澳人，大多數人以英式的思維方式來考慮政府的《施政報告》，持抗拒和反感的態度。

澳門特區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在過渡期以穩定為前提，是可以理解的。

整體經濟的發展不單涉及勞工界，且涉及工商界，整體經濟發展不利，對勞資雙方都不利，港澳大橋等大型基建未能得以落實，亦可能與資源問題有關。

梁維特

首份《施政報告》提出了許多切合實際的理想，但需要實際行動予以配合，應該給予時間，拭目以待。

容永恩

回歸三個月，可以見到特區政府、居民、輿論之間的溝通有所加強。例如旅遊業中存在的問題，據了解，旅遊局的高級官員都是非常關注的。

梁維特

同意公務員價值觀念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

關恩賜

不應該把所有責任都推在前朝政府身上，任何施政都應予以時間規限，不能拖。商界有其困難，勞工有其困難，公務員隊伍中所存在的問題，亦應予以解決，不能只推卸在前朝政府身上。

李沛霖

特區政府剛成立，而澳葡政府又確有許多陋習遺留至今，問題的解決確非一朝可成，急不來，但市民的求變

心切亦是可以理解的。

首份《施政報告》從整體來講是較好的，政府亦有具體措施，同意應增加施政的透明度，要有監督機制。

澳門居民以不同的心態去面對過往的澳葡政府和今天的特區政府，故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當家作主”的心態使澳門居民對特區政府有更高的要求。當中，應該加強溝通，多提意見和建議，共同建設澳門特區。

“固本培元”是合理的，保持穩健發展是應該認同的，但在施政的過程中，亦應對嚴重的問題予以處理和改善。

鄭國強

回歸效應一瞬即逝，旅遊業的現狀不改變，對旅客的吸引力下降，而目前民間的聲音不夠多，仍有發表的餘地，應該更加主動地反映意見。

期望八月份的第二份《施政報告》能有更多好的消息。

劉品良

目前澳門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已加強了與民間的溝通，應利用這個條件，透過所有渠道，主動地多提意見。

同意不應對特區政府施予過大的壓力，但對部份表現欠佳的部門是必須施予壓力的。

“時事座談會”

66 時事座談會

台灣局勢變化與

台澳關係發展前瞻

座談會紀要

五月二十日，台灣新任領導人陳水扁發表就職講話，引起了海峽兩岸，以致全球的普遍關注。為探討台灣局勢變化與陳水扁的就職講話對兩岸關係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澳台關係的未來發展路向，本中心於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時，假本中心會議室舉行了內部座談會。會議由本中心監事長楊允中主持，出席的本中心成員及各屆友好包括有：楊允中、劉本立、余健楚、鄧祖基、劉藝良、何富強、區秉光、劉伯龍、鄭國強、劉品良、高展鴻、黃義滿、張作文、唐建、劉健豪、王樺、陳俊拔等。



首先發言的楊允中先生表示，對台灣形勢應採取多視角的觀察和理性化的判斷。陳水扁當選後基於島內與內地的壓力，不得不採取低調姿態，作出一定的策略調整，刻意淡化台獨色彩。但他認為，陳水扁以及其所屬的民進黨本身的背景就是台獨，搞一中一台，期望陳水扁近期有明顯改變是不現實的。故兩岸未來走向，首先應向影響陳水扁取向的台灣二千三百萬選民着手，通過他們不要讓其偏離統一方向；其次是寄望於下屆台灣大選，爭取更多台灣選民支持主張兩岸統一的人上台。而呂秀蓮之流的表演，適當地批一批也就夠了，不能讓他們牽着走路。當前兩岸雙方都應盡

量搞好自己的事情，立足於自身的發展，此長彼消，當大陸成為世界強大的經濟實體之一後，台灣問題的解決也就水到渠成了。澳門應該發揮“一國兩制”優越性的示範作用，以促進兩岸統一盡快實現。為此，澳門必須先解決失業問題、振興經濟、動員各界力量齊心搞好澳門，用“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事實來說服台灣同胞。

此外，楊允中先生還提交了一份書面發言稿(詳見附件一)，論述了個人對台灣問題的看法。

劉伯龍院長認為，陳水扁就

職演說表明其受到很大的壓力，他為了鞏固“總統”位置，在其任期內的四年絕不會宣佈台獨。同時，他提出了兩點意見：第一，應以輿論壓力，利用各種方法逼使陳水扁在其地位未鞏固之前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第二，在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放寬談判的底線，讓台灣民眾覺得大陸是以一種合理和理性的態度對待兩岸問題。他反對採用武力威脅等過激行動。陳水扁沒有其他出路，他的唯一出路是承認“一個中國”。內地應該利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經濟貿易的影響力來尋找突破兩岸問題的好方法。

劉品良先生認為，國內在台灣問題上，不應“把門檻得太緊”，否則效果不好。他引述他的一位台灣朋友的意見，認為過激的言行，只會產生反作用。他又認為，陳水扁已經成為台灣的新領導人，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同時，陳水扁在目前的形勢下是無可能宣佈承認“一個中國”的，北京中央應該充分考慮整體情況，不要把談判的底線設得太高。

劉品良先生同意楊允中先生的意見，認為國內應加快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上自由開放的步伐，要正視台灣居民“經濟上要繁榮，政治上要自由”的訴求。他又認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拖得越長，對台灣島內台獨勢力越有利。在澳台關係方面，劉品良先生認為，作為兩岸橋樑之一的澳門，應意識到“一國兩制”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重要意義，因為除了澳門本身利益外，還要為台灣作示範作用。他強調，澳門不能“過左”，要發揮自己的特殊橋樑作用，靈活處理政治上的問題。

區秉光先生指出，台灣有不少民眾的本土意識相當強，若陳水扁立即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他可能做不成“總統”，因此，陳在任期的四年內，必會採取“不統不獨”的政策。他又以韓國及日本的政黨輪替對兩地帶來的影響為例，指出台灣島內的政治意識仍未發展至成熟階段，加上台灣民眾本土意識強，陳水扁既已成為新的總統，民眾一定會給予支持。然而，在現階段陳水扁的政府仍然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央的對台政策不宜過寬亦不宜過緊。目前，澳門應該做好中間人的角色，加速自身經濟的發展，完善社會內部環境以能更好地發揮中介橋樑和示範的作用。

鄧祖基先生認為，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多數台人冀保持現狀，因此，陳水扁還不敢奢言台獨，即使是連戰或宋楚瑜當選，也會“不統不獨”。而“一國兩制”正是保持現狀的最佳模式，問題的關鍵是如何使台胞對“一國兩制”的恐懼感消除。作為澳門，應研究如何擔當好“一國兩制”優越性的示範作用。他強調應從文化、經濟、政治等多個層面，強化對台灣民眾的

宣傳，讓廣大台胞了解和認同內地，是統一大業的至關重要。

鄭國強先生認為，意識形態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香港回歸祖國初期，港人對“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認知也很低，目前，已有所改變。要台灣民眾認同“一個中國”，仍需要時間。他又表示，在現時的情況下，中央在處理台灣問題時，利用“經濟牌”是較佳的策略。如果兩岸之間真的爆發戰爭，將會使中國的綜合國力至少倒退30年。而消除兩岸間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劉藝良先生介紹了深圳有關台灣問題研討會上的部份情況，並指出，陳水扁是一個善變的政客，例如，從最近他刻意避談台獨，而利用身邊的內閣人員去宣揚“台獨”，以試探島內、島外的反應就可以看出此點。故此，在台灣問題上，不宜採用過激的言

行，但適當的給予壓力還是需要的。另一方面，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是無認識的，只知道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不適合他們。因此，澳門應該及早發展好經濟，讓台灣民眾看到澳門在回歸後，生活模式得以維持，社會狀況更加良好，以證明“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同時，澳門要繼續充當中介角色，發揮好橋樑的作用。

高展鴻先生認為，台灣島內青年一代本土意識強，對中華文化欠缺認同，對內地改革開放的現實了解亦不深。可考慮以文化活動，甚至是較低層次的文化交流活動，作為其中一個突破口，利用澳門作為海峽兩岸的一個會合點，發揮澳門的橋樑作用，使台灣青年對內地的發展現狀有比較準確的了解，為兩岸統一作貢獻。

鄧祖基先生認同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其中，媽祖文化應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劉健豪先生建議澳門開放賭權予台商，藉此賺取台商的金錢外，也可以讓台商更好地認識澳門，以至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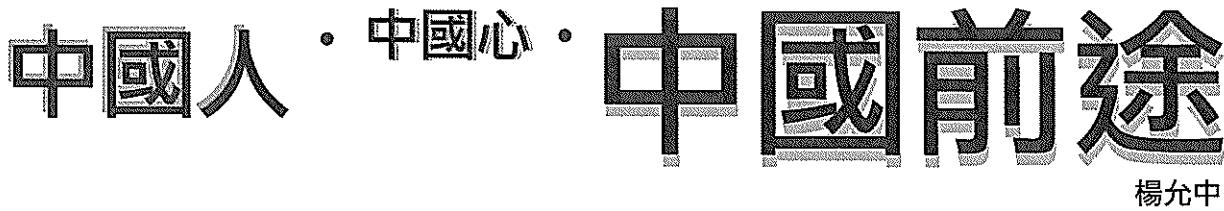
余健楚副會長表示，參加深圳的會議受到很大的啟發，有台灣人認為，內地並不了解他們的需要。要解決台灣問題是“硬不得”的，要從“軟着陸”着手，以贏取台灣民眾對內地的信心。

黃義滿先生則向會議提交了書面的意見(詳見附件二)，提出了個人的觀點和建議。

與會者都認同陳水扁台獨的本質可能隨着勢力鞏固而逐漸暴露，故內地的對台政策宜採用靈活措施，既要適當施以輿論壓力，亦注意不以過激的言行來刺激，避免台灣越走越遠。

在澳台關係方面，與會者認為，澳門要做好協調中介的角色，在經濟與政治層面對台發揮示範作用，把“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展現在台灣居民面前，以贏取他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附件一》



一. 台灣問題的性質

1. 香港、澳門相繼回歸後，台灣問題隨之凸顯，台灣問題的合理解決更具突出迫切性。台灣問題的最後解決面對兩個層面的抉擇：一是解決的途徑或方式，二是解決的時間。
2. 人所共知，台灣問題是中國五十年前國共內戰的後遺症。參加那場內戰的對立雙方在五十年代末期，地位、角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發動內戰一方失道寡助，喪失天下，退蹤台灣孤島，被迫迎戰一方得道多助，贏得了全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國土，建立一個新中國。
3. 雙方的力量此長彼消，影響亦此增彼減。特別是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並宣告“把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驅逐出去”。1972年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中，美方

亦表示：它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持異議。

4. 海峽兩岸至今未能解除交戰狀態。雙方對峙所以延續，主要是外來勢力的干預。解決兩岸對立，必須徹底排除外來干涉；實現兩岸和平，必須堅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企圖仰仗外國勢力的介入可以長期偏安一島、自立門戶，妄圖搞兩個中國也好，一中一台也好，都是全體中國人民、全體中華民族不能容許的，也是國際社會不能接納的。

二. 台灣問題的解決途徑

1. 既然是內戰遺留問題，其解決當然不能排除使用戰爭手段，即非和平手段；既然是內政問題，當然要由兩岸中國

人自行作主，不容任何外國勢力插手干預。

2. 考慮到歷史和現狀，考慮到國際上和平、民主、合作、發展已逐步成為主流思潮，大陸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曾構想由武力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台灣的可能性，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進一步形成了全新的“一國兩制”構想，到九十年代則更加明確地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最後解決台灣問題的總思路、總原則。
3. 江澤民主席 1995 年 1 月 30 日發表的八項原則重要講話，第一條也是最基本的一條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並提出“作為第一步，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近年又反覆重申：“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錢其琛副總理以權威人士身份宣佈：“在統一之前，在處理兩岸關係事務中，特別是兩岸談判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分割”，在此基礎上，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4. 考慮到事態發展存有變數，在全力推進和平統一過程中，不能把非和平手段加以排除。前提是：不能搞台獨，不能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也不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使用非和平手段完全是被迫的，萬不得已的、備用的，其出現可能性是很低的。如果台灣當政者不是利令智昏、孤注一擲，這個球是不致被踢壞的。

三. 台灣問題的解決時間

1. 五十年代國共兩黨之間的內戰只持續三年便定大局，但其後遺症拖了半個多世紀，兩代人逐步消失了，而兩岸至今尚不能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這不能不看成是全體中華民族的最大遺憾。
2.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大陸、台灣在爭取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過程中，各自取得不錯的成果。中國人自尊自信、自主自立、改變面貌的決心和能力，贏得了國際上的普遍尊重，中國人的智慧和潛能得到了廣闊的發揮空間。
3. 中國的發展需要時間，中國人的思考也需要時間。雖然在我們龐大的民族中，今天有今後也會有少數崇洋媚外、賣國求榮之輩，但具強烈中國意識和民族感情的億萬同胞始終是一道不可越逾的萬里長城。憑藉不可摧毀的中國心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憑藉日益昇華的民族智慧，在一個不太久遠的未來，探索出一個為兩岸最後都可接受的和平統一方案，是絕對不成問題，不容懷疑的。
4. 在條件暫時還未成熟的今天，理性、務實的作法是在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是中國人的大前提下求同存異，在認同當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大前提下求同存異。對於台灣新領導人來講，這並不是什麼過高的要求，而是合情合理

的一個表示。如果不肯審時度勢、順應歷史潮流、摒棄分裂主張、肆意挑起事端、惡化氣氛、製造麻煩，那麼到頭來也只能有一個結局——被歷史所拋棄。

5. 在大勢所趨、別無選擇的前提下，台灣問題的最後解決相信依然離不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框框，離不開“一國兩制”的科學界定和創造性實踐。只要台灣新領導人不再製造新麻煩，肯於約束自己的言行，再多等幾年恐怕也未嘗不可，待兩岸實力對比上進一步發生深刻的變化後，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局面自然就可以出現。

四. 善意、誠意與理性思維

1. 2000 年 3 月 18 日台灣領導人換屆選舉結果顯示，陳水扁所以能以微弱多數票當選，既同李登輝運用政治手腕、暗渡陳倉有關，又同台灣當前不具備一流政治人物有關，既同台灣選民對原執政黨黑金政治、腐敗無能不滿，要求迅速改變現狀有關，又同選民面前沒有更多選擇空間有關。
2. 陳水扁當選後，一方面言談變得謹慎，面對海峽兩岸強大輿論壓力，不得不採取低調姿態，甚至拋出：“不會宣佈台灣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即所謂“五不”政策，另一方面又大擺迷魂陣，大作文字遊戲，不肯就一個中國這一最實質、最基本的問題作出任何正面表示，顯然尚未顯示出改善兩岸關係的足夠誠意。其下一步施政走向，只能奉以“拭目以待”。
3. 台灣政局的這次改變同樣從另一側面證明：“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古訓。李登輝執政十二年來步步滑向分裂，最後落得個被提前打倒的可恥下場，同樣，台灣新領導人如果置廣大海內外同胞的民意於不顧，繼續玩弄花樣，甚至恣意挑畔，重挑內戰戰火，把兩岸關係引向危險邊緣，那麼，其結果的可悲將是沒人懷疑的。
4. 在新時代發展經濟要有創新思路、創新意念；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更要依靠理性思維，依靠最小代價最大成果的解決方案，依靠平等協商、共同受益的雙贏取向，依靠人民群眾集體智慧的發掘和政治人物科學決斷。祇要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一份子，認同中國祇有一個，台灣和大陸的任何部份一樣，都是構成整個中國不可缺少的要素，認同中國內部問題可以由中國人自行解決，那麼通向和平統一的大道就是暢通的。中華民族是個值得自豪的民族；中華民族世代相襲的國土是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概念；掌握自身命運、理性化的當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是前所未有的，它是能夠化解分歧、防止分裂的；海峽兩岸的發展前景廣闊，實現和平統一之後，中國前途更加不可限量。
5. 在兩岸實現和解，走向統一的征途中，澳門特別行政區不

應該是沒有作為，而應該是大有作為；不應該是消極等待而應該是積極行動；不應該是無奈觀望而應該是理性思考。澳門的直接目標是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加快自身發展，間接目標是成為兩岸關係改善、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最後得以實現的一個有效示範地；澳門應受到更多重視，澳門人更應善自珍重自己的特定地位，發揮好聯絡站、助推器的積極作用。

反對拋宗棄祖、打擊分裂行為

《附件二》

華夏青年對國家統一

互相促進的思想效應

黃義滿

台灣選舉“總統”，陳水扁當選，真正一石擊起千重浪！

其結果引發台海兩岸關係新一輪不安因素；引發台灣島內政壇震撼性動盪；在全球華夏子孫中間激起憂國之情。

全民皆思慮隨之而來的發酵作用和統獨走勢，各方輿論政評，數裏雄成敗、說民主質素、棄保打挺策略、統獨歧見是和是戰預估，等等評說紛呈，作為澳門一隅之旁觀者，憂戚關注亦鼎沸騰騰。

側看陳水扁當選，演出成功，誠為李登輝精心編排，在“台獨”心願上，陳李二人可謂同氣連枝。

陳氏為現實需要，雖然積極模糊其詞放軟示好，然而從未放棄其不承認“一國”原則，頻呼與中國對等談判之兩國關係，“一中一台”之“台灣是排於中國之外的政體”的台獨立場，毫不隱藏，祇差未宣諸口，及尚未有如李登輝媚日之卑鄙行徑而已。

尤幸台島同胞仍是大多數未有對陳水扁之“台獨”予以認同，但時日一長，難免狹隘族民不良意識對新一代成長者污染混淆，似是而非的島民獨立自決歪理滋長下，必起漸遠疏離國家民族之危機，所以向台灣同胞，曉以民族大義刻不容緩！

再從選戰中分析，為何台島同胞，仍未全面接受“一國兩制”，更被政客們慷慨激昂地以不做香港第二，澳門第二為口號，爭取選票，作為澳人何堪默認，實有探究之必要。

個人認為我等青年工商界者，既非專家，又非論客，當然不宜拾人牙慧，拼湊文抄以作招搖，但作為中華兒女，國家民族事豈可漠不關心，故此不得不予以深思，以發感言，共同表達民願。

在民族大義面前，國家主權，版圖完整之原則絕不退讓，必需盡一切之努力及施行任何正義措施遏抑及打擊分裂國家行為，官方立場必需在一定底線前堅定不移，絕不含糊！

實事求是地面對政治現實，“一國兩制”是合理解決歷史問題的權宜過渡之計，但我們必需爭取在實踐過程中擇善而從，相應發展成為合符國家民族自強的根本目標，作出最有利而具遠見的改革方向，成為具中國特色的“一體國策”爭取全民認同，真正掌握自己國家民族命運，不為外國左右影響，穩步向前發展。

民間可通過各種渠道，從中華民族團結自主的思想教育開始，無論身處何地的中華民族傳人，不該挾外自利而拋宗棄祖！正視數千年來炎黃子孫不分大小族群，同根同源，同種同文，維繫於中華文明之中，通過經貿文化交往，將中華文明，互相促進，融匯貫通，爭取愛國愛民不分地理界限之統一思想，於年青一輩成長過程中孕育，青年一代更應正確認識歷史，勇於承擔，國家民族必定要凝聚力量，廣泛團結，方能步向健康均富發展，內不分裂，外不受侮。

因此任何分裂國家行為，國家必需強硬對待，民氣必需作出多方面感染予以配合，剛柔並濟，全力支持！

統一大業，畢竟尚在艱難路上，祇有爭取得台島民心，自然水到渠成，華夏青年要在國家民族統一而互相促進的思想發揮效應，當然責無旁貸！